

專輯論文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 情緒分析的視角

鍾智錦、林淑金、劉學燕、楊雅琴

摘要

本研究在集體記憶理論、情緒理論和話語機會結構理論的基礎上，分析不同類型和結局的新媒體事件在網民話語中遺留的情緒記憶。本研究建立了2002-2014年間262個新媒體事件的數據庫，爬取了涉及該事件的新浪微博，並通過LIWC軟件分析微博文本中蘊含的情緒。研究發現，人們對新媒體事件的記憶與傳統媒體的報道呈正相關。事故災難、食品藥品安全類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次數最為頻繁；公民倡導和愛國主義事件最能夠激發集體記憶中的正情緒；惡性違法和社會治安問題帶來的焦慮和憤怒情緒最為明顯；反映制度不公和社會階層矛盾的事件的敏感性降低了其在社交媒體中被討

鍾智錦，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新媒體與政治傳播。

電郵：zhongzhijin@hotmail.com

林淑金（通訊作者），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數據挖掘、

數據可視化。電郵：linshujin@hotmail.com

劉學燕，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研究生。研究興趣：健康傳播。

楊雅琴，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研究生。研究興趣：政治傳播。

論文投稿日期：2016年3月17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9月21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論的話語機會。引發社會救助的事件儘管體現了社會的「正能量」，但同時也會遺留悲傷情緒；一旦新媒體事件導致了人員入獄、人員死亡，或者改變了政府的決策，網民會產生明顯的憤怒情緒，而將官員拉下馬的新媒體事件能夠顯著地緩解人們的憤怒情緒；導致人員入獄和人員死亡的新媒體事件更可能遺留焦慮情緒。

關鍵詞：集體記憶、情緒、新媒體事件

Special Issue Article

New Media Event in Collective Memory (2002–2014): A Perspective on Sentiment Analysis

Zhijin ZHONG, Shujin LIN, Xueyan LIU, Yaqin YANG

Abstract

New media even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research tha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Chinese society. This quantitative study appli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the emotion theory, and the discourse opportunity theory to examine new media events. The users of social media are also the writer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discourse on social media could be seen as comprising the text of collective memory. When people discuss a specific new media event, they express their own emotions, which they share with their social networks online. We built a new media event database including 262 important new media events from 2002 to 2014, and we coded the types and outcomes of the events. We then collected data from Sina Weibo using the keywords of the events on Python. We used LIWC, a software that is widely implemented in sentiment analyses, to obtain interesting findings. First, the more that a specific event was reported by conventional media, the

Zhijin ZHO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Shujin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data mining, infographics.

Xueyan LIU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Research interest: health communication.

Yaqin YANG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Research intere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2017)

more it was discussed on social media. Second, different types of new media events produced different impressions and emotions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Specifically, events that were characterized by citizen advocacy and nationalism were the most likely to elicit positive emotions. Accidents, disasters, and events related to food and drug safety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Events that were related to crime and social security were the most likely to provoke negative emotions, especially anger and anxiety.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elicited the most sadness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However, new media events caused b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r the injustice of the society were not discussed frequently, which was an unexpected findi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eople care more about the events that are close to their daily lives than events that reflect social problem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topics about social structure or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politically risky, which reduced the amount of related discourse on social media. Furthermore, the outcomes of new media events were also related to emotions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When the events caused the death of people or changed the policies or decisions of the government, they raised feelings of anger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while the fall of officials reduced such feelings. Anxiety existed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events caused death or imprisonment. The events that increase social support elicited sadness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lthough the outcome was positive.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emotion, new media event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ong, Z., Lin, S., Liu, X., & Yang, Y. (2017). New media event in collective memory (2002–2014): A perspective on sentiment analysi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105–134.

致謝

本文是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項目批准號：15BWX063）、廣州市「大數據與公共傳播」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以及中山大學「三大建設」專項資助（項目編號：99123-188233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新媒體事件」一詞來源於「媒介事件」(戴揚、卡茨, 2000), 是中國社會各種熱點問題在網絡空間的映像, 體現了新媒體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力。隨著互聯網在公共事件和議題中的作用日益為大眾所認知,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學者們用「新媒體事件」、「網絡輿情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等概念來凸顯互聯網的重要作用。新媒體事件之「新」體現在事件的爆發或者推動依賴於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媒介平台; 事件的主導者或參與者不再由傳統媒體精英壟斷, 而吸納了大量草根網民; 事件是否能引爆、是否能傳播是網民、傳媒、政府、企業組織等各種力量角逐和競爭的結果。過去十幾年, 新媒體事件層出不窮, 對這些事件的梳理、研究成為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學者的關注點。儘管新媒體事件數量繁多, 但絕大部分事件在輿論場中的生命週期比較短暫, 一個事件尚未完全結束, 另一個事件很快又闖入公眾的視野, 轉移了人們對前一事件的注意力。本研究力圖在話語機會結構理論的框架下, 爬梳人們對過去十年間新媒體事件的討論, 探究新媒體事件對網民心理的影響, 發掘人們在回憶、傳播新媒體事件時的情緒反應。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的提出

新媒體事件

過去幾年, 中國學術界關於新媒體事件的研究積累豐富, 大致呈現出幾個典型特點: 基於個案分析方法深度剖析單個事件, 梳理其來龍去脈, 常常探討新媒體在該事件形成、發展、演變過程中起到的作用; 從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角度分析事件的性質、成因與發生機理, 關注事件中的話語表達、情感動員、網民心理、政府和傳統媒體的作用等細分話題; 關於新媒體事件的處置方法或對策研究。近年來, 有研究者以多案例的方式來探尋新媒體事件的發生規律, 大多以某一段時期內的多個新媒體事件為研究對象, 分析其表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特徵、爆發機理、傳播機制。如鍾智錦、曾繁旭(2014)總結了2002–2012年182個新媒體事件的誘因和表現；鍾瑛、余秀才(2010)系統考察了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絡輿情事件的時空分布、問題領域，以及網絡輿論對事件解決的多向作用；李良榮團隊(2013)對2010–2011年間發生的195個網群事件採用定性比較研究方法(QCA)，認為事件屬性、傳播屬性等因素是新媒體事件爆發的關鍵成因。此外，還有研究者就某一特定領域的網絡事件進行多案例分析，如劉怡、謝耘耕(2014)對2011–2013年282起影響較大的網絡反腐事件進行實證分析，描述反腐事件發展的階段、內在機理和現實存在的問題。

總體而言，目前的研究較少以新媒體事件的影響為重點，儘管有少量的研究探尋了新媒體的介入對該事件最終結果的影響，但僅限於質化的分析，還缺少統計意義上的證據。目前，還極少有研究探討新媒體事件對人們心理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人們是否還記得曾經熱鬧一時的新媒體事件？這些事件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會帶來什麼樣的情緒反映？這些心理影響可以通過集體記憶理論來詮釋。

集體記憶理論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2002, p. 45)。個體不僅在社會環境中獲得記憶，而且有賴群體的框架來喚回和重構記憶。除此之外，不同學者對集體記憶的定義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界定。法國學者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2012)根據記憶的時間跨度及意涵區分了溝通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前者產生於人們的日常溝通中，往往只能存活有限的生命週期。後者則超越了日常生活和個體生命週期，特指神話傳說、傳統慶典，以及被圖片、文字等媒介保存下來的關於過去的信息。根據記憶的活躍程度，阿斯曼夫婦又將文化記憶劃分為活躍的功能記憶(functional memory)和被動的存儲記憶(stored memory)(Assmann & Czaplicka, 1995；阿斯曼，2012)。前者與現實相關、被經常啟動和使用；後者則類似於沉睡的火山，處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 (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於記憶的邊緣地帶，難以與現實對話 (阿斯曼、阿斯曼，2012)。Olick (1999) 從個體與集體的關係出發，區分過「集體記憶」和「集合記憶」的概念。「集合記憶」是指個體記憶的加總，個體仍舊是記憶的主體；「集體記憶」則更關注群體層面的符號、儀式，以及超越於個體存在的社會和歷史要素 (錢力成、張翮翮，2015)。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學科對記憶的研究視角不同，社會學對集體記憶的研究更多的是中觀層面，強調群體、社會、制度在個體記憶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而心理學更看重記憶的個體維度。

過往的研究對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亦有著豐富的探討。哈布瓦赫認為記憶並非對過去的保留，而是在現在基礎上的對過去的重新建構 (哈布瓦赫，2002)。錢力成、張翮翮 (2015) 總結道，「國家權力視角」是中國記憶研究中常見的視角，強調國家的力量貫穿於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個體或群體可以認同或反抗國家對記憶的塑造，但都必須面對不曾缺席的國家權力 (p. 227)。陳韜文、李立峯 (2010) 發現，集體記憶是在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這三種行動者在特定社會政治環境下角力的結果，其中傳媒對事件報道產生的社會烙印影響著集體記憶的穩定性，而社會政治環境則為集體記憶的形成和擴散提供了話語機會。周海燕 (2013) 通過梳理以「南泥灣精神」為核心的大生產運動記憶的形塑，發現權力通過對記憶的操縱來培養合法性信念。李紅濤、黃順銘 (2014) 對南京大屠殺集體記憶的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對南京大屠殺紀念報道的重心在於當下，比如，指向過去的「軍國主義」更多用來批判當下的「右翼」行徑，顯示出「當下之惡」的話語優先性，傾向於將右翼否認歷史的行徑建構為當代的文化創傷。

在新聞傳播學學科裏，媒介和集體記憶的關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周海燕 (2014) 總結了媒介和集體記憶關係的兩個基本問題：其一，大眾媒介對集體記憶的傳播產生何種作用？一些研究者認為，大眾媒介的報道能夠將當下的影像、符號、情境與過去相鏈接，集體記憶的連續敘事能打通社會的現在、過去和未來。另一些學者則關注權力對新聞生產的控制，使得一部分記憶得以「延續」，而另一部分記憶則由於新聞話語的缺失而斷裂 (周海燕，2013)。其二，大眾媒介如何建構集體記憶？如 Klačic (2011) 指出，大眾媒介對某些議題或事件的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擇同時也意味著對另一些議題或事件的放棄，被放棄的部分常常被集體記憶所遺忘，因此忘卻也是大眾媒介建構記憶的方式。此外，媒體為迎合權力對某些議題的凸顯也使得這些議題被重點呈現，使之在集體記憶空間裏佔有較大的比重 (Wertsch & Billingsley, 2011)。

互聯網的普及產生了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密切互動，關於新媒體和集體記憶的關係，國內外均有學者涉足。Van Dijck (2007) 認為，新媒體的普及帶來的數字化、多媒體化以及「谷歌搜索化」使得以影像為介質的集體記憶在虛空間裏儲存和傳播，從而重新定義媒介對集體記憶的塑造。胡百精 (2014) 認為，傳統的集體記憶往往是由族群中的精英建構，而新媒體環境下的集體記憶則進入草根大眾書寫的時代，撰寫和闡釋集體記憶權力被重新分配。大眾的介入使既有的集體記憶不斷被補充和解構，不同社會地位和背景的書寫者對集體記憶的敘述使得記錄「完整歷史」、「完整記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集體記憶也突破了傳統集體記憶的唯一的敘述框架，多元話語使得記憶的版本更豐富。

在研究方法上，Kansteiner (2002) 指出，集體記憶研究的成果雖然豐富，但在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大部分記憶研究致力於在特定的歷史、地理和媒體情境下對事件的再現，而忽略了對受眾的研究。周海燕 (2014) 也總結道，集體記憶研究最為常見的路徑是以文化研究理論為基礎，運用話語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對影像、新聞報道等進行個案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很多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運用個案驗證了現有的記憶理論，難以有創新和突破 (p. 46)。相對而言，關於集體記憶的量化研究非常少見。值得關注的是劉于思 (2013) 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研究了維基百科中不同類型、地域的歷史事件之間的連結，發現互聯網賦予集體記憶公民化書寫的可能性，使之與「官方」生成的集體記憶產生競爭和對話。周葆華和陳振華 (2013) 在上海進行的問卷調查，首次在經驗層面上探討當代大學生群體對「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憶，但僅僅限於研究對象對新媒體事件的提及次數，並沒有深入到集體記憶的情感特徵。

集體記憶與情緒

情緒分析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 Twitter、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體中的內容 (Chmiel et al., 2011; Xiong, Zhou, Huang, Chen, & Xu, 2013)。情緒是人類存在中的重要面向，Rimé 和同事們強調情緒的社會分享：當一個個體經歷了某種情緒時，他 / 她往往會傾向於將自己的所思所想與別人分享 (Rimé, 2007a; Rimé, Mesquita, Philippot, & Boca, 1991)。這種境況會重複產生在生活片段發生之後的幾個小時、幾天甚至幾個月之後，人們對某種情緒感受越強烈，則越樂意分享它，接受情緒渲染的人也越多，情緒分享的渴望也會延至更長的時間。社會事件引發的情緒 (如集體勝利、集體損失、挫敗、成功、事故、災難、共同面臨的威脅等等) 可以通過大眾傳媒擴散到人群之中，每個人都可以作為群體、小區和社會的一份子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情緒體驗。因此，公共事件裏的情緒分享有利於建構情緒氣候，而長時間的情緒氣候則會形成集體情緒記憶。比如，每當「911」事件在紀念日或者其他相關事件中再現於媒體時，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恐懼、焦慮和無助就會被一次次地重新啟動 (Rimé, 2007b)。

情緒對記憶有利還是有害？心理學的研究一直有不同的答案。有研究發現，當某個事件引發了情緒，交感神經系統會釋放腎上腺素等荷爾蒙，荷爾蒙則反過來啟動杏仁基底外側核產生去甲腎上腺素的系統，這都有助於大腦其他區域的長時間記憶 (McGaugh, 2004)。然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情緒是記憶窄化 (narrowing) 的表現。記憶窄化現象指的是情緒事件中的核心特徵會強化記憶，但是邊緣或背景特徵往往會在記憶中受損。情緒對記憶邊緣細節的消極作用主要來源於忽視 (Levine & Pizarro, 2004)，因為當人們的注意力被某種情感刺激吸引的時候，那些不含情緒的信息則不會吸引這麼多的注意，也不太可能被記憶系統編碼 (encoded) (Compton, 2003; Öhman, Flykt, & Esteves, 2001)。即使中性信息被編碼，它們在記憶系統中也很難被重演 (rehearsed) 或者深加工，因此更難以存儲在長期記憶裏 (Finkenauer et al., 1998)。人們在回溯信息的時候，往往會流連於他們認為重要的信息，或者和自身息息相關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往往和情緒緊密相連，中性信息則很少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提供這種可供回溯的綫索 (Lyubomirsky, Caldwell, & Nolen-Hoeksema, 1998)。由於人的記憶和注意的容量有限，當情緒信息佔據了大部分空間時，中性信息或者邊緣信息能在記憶系統中保留的幾率就變得很小 (Levine & Edelstein, 2009)。對應於現實世界裏的場景，人們往往會對自然災害 (Sotgiu & Galati, 2007)、兒童性侵害 (Alexander et al., 2005)、身體傷害 (Peterson & Bell, 1996) 等創傷經歷的核心特徵記憶深刻。

在對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理論、情緒理論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認為，社交媒體中的話語可以成為集體記憶的一個面向，社交媒體的用戶是集體記憶的書寫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交媒體話語中蘊含的集體記憶更接近阿斯曼夫婦的「溝通記憶」(2012) 和 Olick 的「集合記憶」(1999) 的定義，人們在社交媒體平台談論或者提及某個新媒體事件的話語，正是草根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然而，由於時間的流逝和大多數人對新媒體事件的「圍觀狀態」，並非所有的網民都瞭解每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細枝末節，因此，人們對新媒體事件的記憶很可能出現「窄化」的現象，即對事件的核心要素保有較為清晰的記憶，但對事件的邊緣特徵的記憶模糊，而情緒反應往往是記憶窄化的表現 (Levine & Pizarro, 2004)。換而言之，一個複雜的新媒體事件在普通「旁觀者」的記憶裏，極有可能被簡化為一些核心信息 (人物、地點、事件性質和結局)，當事件本身在爆發時引起了一定的社會情緒時，這種情緒會和核心信息一起存活在人們的記憶裏。當人們在社交媒體中談論特定的新媒體事件時，也往往會將情緒分享至社會網絡之中。一旦社會分享產生，情緒就能蔓延至其他個體，這種超越時間和空間層面的情緒擴散有利於建構和鞏固人們對於集體經歷的共享知識，以及強化人們對事件的情緒反映 (Rimé, 2007b)。Papacharissi (2015) 提出「情感公眾」的概念，認為公共表達中的情感能夠聚集公眾。情感是人們對事件、公共議題和私人生活產生的各種感覺的匯總，是一種中和、聚集公眾的力量。數字空間的表達和網絡連接具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共同的情緒能夠統一公共爭論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即便公眾與內容之間的連接斷裂了，情感和情感聯繫仍然會保留，並且在相互連接的公眾之間產生共鳴。Papacharissi 的觀點正好是集體情緒記憶存在的佐證。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 (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基於以上討論，本研究希望將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和情緒這三者結合起來，兼顧「集體記憶」對社會特徵的聚焦，以及「情緒記憶」對個體特徵的聚焦，既從宏觀層面考慮外部因素對集體記憶塑造的影響，又從微觀層面探討事件的具體特性如何構建人們的記憶，以及記憶如何出現情緒窄化的現象。

話語機會結構

社會運動研究中的話語機會結構理論 (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 可以用來研究關於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憶如何構建。Koopmans 和 Statham (1999) 認為，話語機會結構主要是用以確定在特定時期特定政體中，哪些思想是「明智的」，哪些對現實的構建是「現實的」，以及哪些宣稱是「合法的」(p. 229)。Koopmans 和 Statham (2004) 解釋道，在公共領域，社會運動者之間，以及運動者和潛在跟隨者之間的溝通，使得他們可以知曉關於當權者對行動的反應，以及關於政治機會、聯盟者、同情者的關鍵信息，從而獲得話語機會。如果集體行動框架能夠與社會政治文化中既有的、合法的思潮相符，則更容易獲得共鳴，被人們接納並取得成功 (卜玉梅、周志家，2015)。Ferree 等人 (2002) 指出，話語機會結構是政治機會結構的一部分，「政治機會結構是行動者利用和抓住的所有制度和文化機會，以達到把他們的訴求帶入政治議程的目的，所解釋的是抗議活動如遊行示威發生的頻率及時間。話語機會結構則側重特定社會中的意識框架及其構建機制，闡釋為什麼有些行動者和框架在公共話語中相比其他而言更加引人注目，並產生更好的政治效應」(p. 62)。可以說，有利於話語言說的一切因素，都能構成話語機會結構。

Koopmans 和 Olzak (2004) 將話語機會具體化為三種要素，第一種要素是「可見性」(visibility)，即信息被傳媒和公眾知曉的可能性，常常通過大眾媒體報道信息的程度來反映，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媒介對信息可見性的分配會直接增加它在公共領域擴散的機會。第二種要素是「共鳴」(resonance)，常指其他人，包括盟友、對手和官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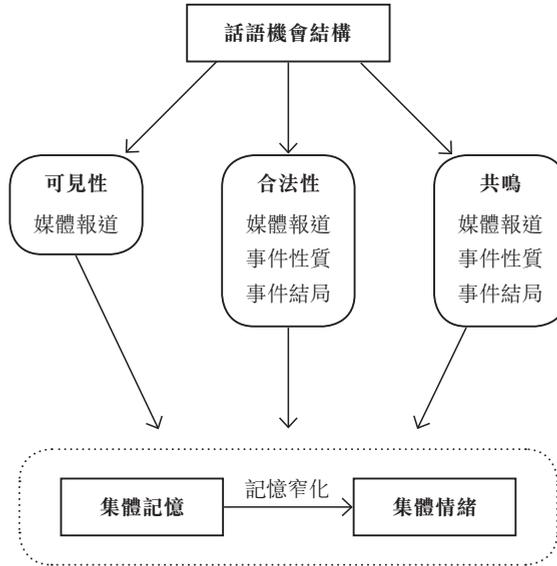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對信息作出反應的程度。無法產生「共鳴」的「可見性」無異於死水一潭，只能提供有限的話語機會結構。共鳴能激發更多的討論，讓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討論。第三個要素是「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公共領域中，平均而言，人們對社會運動行動者的支持程度超過對其的抵制程度。

我們認為，在新媒體事件集體情緒記憶的建構過程中，這三種要素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媒體對某類事件的報道程度體現了事件在公眾眼界裏的「可見性」(visibility)，向公眾傳遞了事件信息，使公眾獲得可以言說的素材；同時，在中國環境下，政府對媒介的管制使得人們能夠做出一種簡單的推論，即，但凡在媒介中出現的事件和話題，往往是被允許討論的。因而，我們認為，媒介對某一新媒體事件的報道頻率，會賦予網民在虛擬空間討論該事件的「安全性」，從而影響集體記憶的塑造。Ferree等人(2002)指出，大眾媒體是話語意義生產過程的核心，但它們只是便利和組織話語的制度和文化結構的一部分(p. 62)。可見，媒介報道構成了重要的話語機會，但不是唯一的話語機會。所以，話語機會還體現在事件本身的特質。一方面，不同類型的新媒體事件發生的原因、表現、生命週期和產生的影響有很大差異(鍾智錦、曾繁旭，2014)，那些層出不窮的同類事件，往往反映了問題的暴露不是偶然，而是普遍現象，從而更容易獲得「共鳴」和「合法性」。那些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件，則因為與集體記憶書寫者社會距離的接近，也更容易因為激發共鳴而獲得更多被言說的可能。另一方面，結局是事件生命週期中的重要環節，反映了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涉事者、政府部門、媒體、草根網民、企業組織等各種力量博弈的最終局面，尤其在一些涉及結構性社會矛盾、事故災難、公共安全的新媒體事件中，結局體現了政府部門對此類事件的處理態度和政策導向。那些具有深遠影響或者重大結局的事件，折射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社會意義，也同樣為公共話語言說和信息擴散提供了機會。所以，在話語機會結構的理論框架下，我們提出，集體情緒記憶的塑造不僅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如媒介的報道，同時也受到記憶對象本身特質的影響。因此，我們的理論框架如下圖所示。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 (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圖一 基於話語機會結構理論的研究框架



根據以上框架圖以及對集體記憶與情緒記憶關係的鋪陳，我們將具體回答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1. 不同類型的新媒體事件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頻率是否有差異？
2. 不同結局的新媒體事件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頻率是否有差異？
3. 傳統媒體的報道是否會影響到新媒體事件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頻率？
4. 網民在回憶和談及過往的新媒體事件時，會流露出什麼樣的情緒？事件本身的類型和發展結局是否會形塑集體記憶的情緒特徵？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研究方法

數據收集

本研究建立了一個新媒體事件數據庫，通過以下管道搜集了2002–2014年的262個重要新媒體事件。

一，參考人民網、新浪、貓撲等網站，《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南方日報》、《新快報》等媒體在2001–2014年間不同的年份評選出的年度「網絡大事」；

二，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2009–2011年公布的中國公民社會十大事件，我們選擇與互聯網密切相關的事件；

三，陳韜文、邱林川主編的《新媒體事件研究》中收錄了1994–2009年的87個重要新媒體事件，我們選擇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重要事件；

四，以「網絡事件」為關鍵詞，搜索2002–2014年的慧科報紙全文數據庫(該數據庫收集了最重要的中文報紙全文，覆蓋面廣，數據完整)，對以上三個管道進行查漏補缺。

事件庫建設好之後，通過慧科(WiseNews)報紙全文數據庫對事件的性質和結局進行編碼。事件性質是一個分類變量，每個事件有且只有一種性質。本研究將事件結局分為八類(詳見測量部分)，每一類結局均是一個啞變量(dummy variable)，每個事件可以有多种結局。因此共有九個變量來描述所有事件的性質和結局。編碼過程由兩個編碼員獨立完成，九個變量的編碼員之間信度(Kappa)為.72–.93(詳見表一)，由第三個編碼員對前兩位編碼員的工作進行檢查，並對不一致的地方進行重新編碼。

表一 編碼員之間的信度

變量	編碼員之間的信度(Kappa)
事件性質	.85
結局_人員入獄	.88
結局_官員下台	.93
結局_政策改變或新政出台	.77
結局_機構或個體問責	.97
結局_人員受傷	.72
結局_人員死亡	.84
結局_財產損失	.86
結局_企業賠償	.89
結局_社會救助	.80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本研究重點考察的另一個變量，即網民對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憶，是通過爬蟲軟件挖取新浪微博的微博內容數據。由於新浪微博在2014年及以前一直是網絡輿論場的重要平台，而且微博對字數的限制令微博的文體、篇幅較為統一，使得對網絡話語的大批量處理成為可能，因此我們選擇了微博內容作為網民情緒記憶的載體。值得說明的是，事件數據庫中的部分事件發生的年份較為久遠，那個時候尚未有微博的誕生，因此在事件發生期間的討論很多發生在天涯、飯否等論壇。但是，由於我們的研究定位在「集體記憶」，即人們基於當下現實對過去事件的記憶，而並非事件爆發時的輿論，因此我們並沒有抓取從事件自發生初期到研究開始期間的所有數據。並且，由於論壇數據本身在內容篇幅、體裁方面較為多元，並且與微博數據有巨大差異，使得分析結果的可比性較差，所以我們選擇聚焦於微博數據。考慮到不同事件在時間長河中的存在歷史是有差異的，我們將事件的發生年份作為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量，納入到統計分析中。

我們首先為262個新媒體事件分別設立了3–5個關鍵詞，並對這些關鍵詞進行一一檢驗，確保能夠比較準確全面地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到相應的事件。然後，通過爬蟲軟件爬取出現過這些關鍵詞的新浪微博內容，經過清理後，共獲得203,020條微博數據。第三個步驟是對獲取的微博內容進行情緒分析，使用的是Pennebaker等人(2007)開發的情緒分析工具LIWC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的中文版，LIWC是詞庫類文本分析工具中使用得最廣的一種工具，該軟件基於一個龐大的語言數據庫來對文本進行心理意義的提取，並將數據材料中的詞與詞庫中的詞進行匹配，輸出正面情緒、負面情緒、憤怒、悲傷、焦慮等指標。LIWC的英文詞庫經過了信度檢驗，絕大多數類別的可信度都在可接受範圍之內，LIWC的效度檢驗是通過效標效度實現的，由於其良好信效度，LIWC被研究者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台灣學者(黃金蘭、林以正、亦泰等，2012)對LIWC進行了繁體中文版的修訂，後來又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簡體中文版，通過檢驗均具有較高的信效度(張信勇，201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測量方法

新媒體事件的性質、結局是通過人工編碼完成。本研究根據事件的性質，將新媒體事件分為如下七類，如下表所示：

表二 事件分類與說明

事件類型	說明
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	權力腐敗、司法不公、言論自由等由於制度不公、結構化矛盾而引起的事件，以及拆遷、徵地等由於執法暴力而產生的事件
組織之間或組織與個人的矛盾	企業糾紛、勞資矛盾、醫患糾紛
環境與食品藥品安全	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問題
公民倡導和愛國主義	公益行動、愛國主義行為等倡導性和共益性的事件
事故災難	自然災害和人為事故
文化道德討論	文化衝突、道德隱私
惡性違法	指個人和組織的違法行為，包括刑事案件、恐怖襲擊事件

新媒體事件的最終結局分為以下幾類：機構或人員輕度問責、人員受傷(不包括事件起因中的人員受傷)、人員死亡(不包括事件起因中的人員死亡)、人員入獄、官員下馬、財產損失(不包括事件起因中的財產損失)、企業賠償、政策或制度改變、社會救助。每個事件可能有多個結局。

傳統媒體對新媒體事件的報道是以事件關鍵詞為搜索詞，搜索慧科報紙全文數據庫，凡在新聞標題中出現事件關鍵詞的則算為傳統媒體對該事件的報道。

新媒體事件在社交媒體話語中的出現頻率由爬蟲工具所爬取的每個事件的微博數量來體現，換而言之，網民在微博中提到某個事件的次數則可以體現為人們在建構關於此事件的集體記憶時，對該事件的關注程度。

新媒體事件在集體記憶中的情緒投射則由LIWC對微博的語義分析得出，分為負面情緒和正面情緒，並且該軟件還會將負面情緒中的焦慮、憤怒和悲傷單獨析出。本研究初步分析發現，絕大多數新媒體事件留在人們記憶中的負面情緒要高於正面情緒，因此，在分析過程中也將具體探索焦慮、憤怒和悲傷這三種負面情緒在不同事件中的記憶呈現。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 (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數據分析與研究發現

研究問題 1 和 2 關注不同類型和結局的新媒體事件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頻率是否有差異，單因素協方差分析 (ANCOVA) 比較了不同類型事件的微博被提及次數的平均數，分析結果顯示，控制了事件發生的年份之後，事件的性質會顯著影響到事件在集體記憶建構中出現的次數 ($F = 2.36, df = 6, p < .05$)。如表三所示，事故災難、食品藥品安全類事件雖然總量不多，但被人們討論和提及的次數最多，顯示這兩類事件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最受關注。

表三 事件類型與網絡討論頻率

事件類型	樣本量	討論量平均數	標準差
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	84	485.50	362.20
組織之間或組織與個人的矛盾	11	591.18	404.06
環境與食品藥品安全	25	746.56	285.35
公民倡導和愛國主義	25	434.32	415.42
事故災難	15	815.40	223.84
文化道德討論	60	444.65	36.75
惡性違法	39	633.26	366.80
總計	259	542.14	372.27

為了探討事件的結局是否影響到人們對某一事件的討論次數，本研究進行了一系列獨立樣本 t 檢驗，分析結果發現，如果新媒體事件導致了政策改變或決策變化 ($t = 2.16, df = 259, p < .05$)、人員死亡 ($t = 3.06, df = 259, p < .01$)、企業賠償 ($t = 2.46, df = 259, p < .05$)、社會救助 ($t = 2.50, df = 259, p < .05$)、人員受傷 ($t = 2.36, df = 259, p < .05$)、人員入獄 ($t = 2.08, df = 259, p < .05$)，人們對於該事件的討論往往比沒有這類影響的事件熱烈。而事件的其他結局，如機構或人員的輕度問責 (往往表現在網絡各方對責任者的批評、責任者遭到行政警告)、官員下台則不會影響到人們討論的熱烈程度。

傳統媒體的報道是我們關心的另一個影響集體記憶建構過程的因素，回歸分析顯示，在控制了事件發生的年份之後，人們對新媒體事件的討論與傳統媒體的報道呈正相關，傳統媒體 (紙媒) 報道得越多，人們提及該新媒體事件的次數越多 ($F = 31.26, p < .001$; $Beta = .17, p < .0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研究問題3探討的是人們在提及新媒體事件時流露出來的情緒，本研究首先提取了微博中的正負情緒，並對比了不同類型的事件中的正負情緒的差異。單因素協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控制了事件發生的年份之後，正情緒 ($F = 3.58, df = 6, p < .01$) 和負情緒 ($F = 4.79, df = 6, p < .001$) 的出現，會因事件性質的差異而有顯著不同。如表四所示，公民倡導和愛國主義事件最能夠激發集體記憶中的正情緒，事故災難和惡性違法事件最容易引發負情緒。

表四 不同類型的事件遺留在集體記憶中的正負情緒

事件類型	正情緒			負情緒		
	樣本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量	平均數	標準差
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	80	404.56	358.49	80	540.21	569.56
企業糾紛勞資矛盾與醫患糾紛	11	596.45	495.52	11	510.27	483.67
環境與食品藥品安全	25	506.80	273.49	25	701.52	433.60
公民倡導和愛國	21	916.90	995.21	21	484.90	507.22
事故災難	15	722.00	343.74	15	1127.87	704.69
文化道德經濟討論	55	528.62	604.99	55	459.24	459.32
惡性違法與治安	37	490.92	415.64	37	1096.59	940.47
總計	244	528.36	524.79	244	652.87	649.26

表五顯示，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環境與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災難、惡性違法與治安這幾類事件在集體記憶中的負面情緒要顯著高於正面情緒；公民倡導和愛國類事件在集體記憶中的正情緒則明顯高於負情緒。

表五 同類事件在集體記憶中的正負情緒之差(正情緒 - 負情緒)

事件類型	配對差分		
	平均數之差	標準差	t
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	-135.65	463.17	-2.62*
企業糾紛勞資矛盾與醫患糾紛	86.18	464.40	0.62
環境與食品藥品安全	-194.72	448.30	-2.17*
公民倡導和愛國	432.00	962.52	2.06*
事故災難	-405.87	712.21	-2.21*
文化道德經濟討論	69.38	518.92	0.99
惡性違法與治安	-605.68	755.43	-4.88**

註：* $p < .05$; ** $p < .01$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此外，配對t檢驗的結果顯示，集體記憶中的正負情緒與事件的結局有一定的關係，帶來社會救助的事件會在集體記憶裏帶來明顯的正情緒 ($t = 2.24, df = 259, p < .05$) 和明顯的負情緒 ($t = 2.34, df = 259, p < .05$)，導致人員死亡的事件會在集體記憶裏帶來強烈的負情緒 ($t = 3.41, df = 259, p < .01$)，導致人員入獄的事件會在集體記憶裏帶來明顯的負情緒 ($t = 3.30, df = 259, p < .001$)。

由於總的來說，過去十幾年的新媒體事件在網民記憶中的負面情緒顯著超過了正面情緒，我們對負面情緒進行了進一步的解構，將其劃分為憤怒、悲傷、焦慮這三種常見的負情緒，並比較了不同類型和結局的事件在這三類負情緒上的差異。單因素協方差分析顯示，控制了事件發生的年份之後，焦慮、憤怒和悲傷這三種負面情緒在不同類型事件中的集體記憶的呈現是有顯著差異的 ($F_{\text{焦慮}} = 2.84, df = 6, p < .01$; $F_{\text{憤怒}} = 4.06, df = 6, p < .001$; $F_{\text{悲傷}} = 4.82, df = 6, p < .001$)。如表六所示，惡性違法 and 社會治安問題給人們帶來的焦慮情緒要顯著高於結構性矛盾、公民倡導和文化道德討論，但此類事件與環境和食品藥品安全事件、事故災難類型事件在焦慮情緒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惡性違法 and 社會治安事件在集體記憶中遺留的憤怒情緒要顯著高於其他六類事件；事故災難給人們帶來的悲傷要遠遠高於其他類型的事件。

表六 焦慮、憤怒和悲傷在不同類型事件的集體記憶中的呈現

事件類型	焦慮			憤怒			悲傷		
	樣本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量	平均數	標準差
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	80	79.60	152.35	80	127.63	174.81	80	67.54	118.62
企業糾紛勞資矛盾與醫患糾紛	11	91.82	113.09	11	183.64	22.44	11	115.18	124.24
環境與食品藥品安全	25	132.00	152.96	25	155.88	155.58	25	63.84	43.87
公民倡導和愛國	21	37.38	35.89	21	114.86	129.86	21	97.43	248.87
事故災難	15	142.93	104.42	15	183.07	155.35	15	271.93	20.39
文化道德經濟討論	55	55.56	79.07	55	156.64	157.46	55	65.18	108.78
惡性違法與治安	37	172.16	184.91	37	328.78	358.71	37	169.51	244.75
總計	244	94.40	139.56	244	172.40	215.50	244	99.38	166.26

事件的不同結局對焦慮、憤怒和悲傷這三種負面情緒在集體記憶裏的呈現也有著不同的影響。表七顯示，控制了事件發生的年份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後，導致人員入獄和政策 / 決策變化的事件會遺留悲傷情緒在人們的集體記憶裏，當社會救助成為事件結局的一部分時，也往往會留下悲傷的印記，因為社會救助常常是因為救助對象的悲慘遭遇所激發的，悲傷本來也是公益捐助、慈善行為的一種情緒動力。一旦新媒體事件導致了人員入獄、人員死亡，或者改變了政府的決策，網民在討論和提及這些事件時，會產生明顯的憤怒情緒，而將官員拉下馬的新媒體事件則能夠顯著地緩解人們的憤怒情緒和焦慮情緒。導致人員入獄和人員死亡的新媒體事件同樣會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留下焦慮的情緒。

表七 焦慮、憤怒和悲傷在不同結局的事件記憶中的呈現

事件結局	悲傷		憤怒		焦慮	
	未標準化 回歸係數	標準化回 歸係數	未標準化 回歸係數	標準化回 歸係數	未標準化 回歸係數	標準化回 歸係數
人員入獄	2.62	.19**	3.19	.19**	3.14	.24***
官員下台	-0.48	-.03	-2.50	-.15*	-1.93	-.14*
政策改變或新政出台	2.17	.12*	3.24	.15**	1.13	.07
機構或個體問責	-0.23	-.02	-0.17	-.01	-1.28	-.11
人員受傷	1.09	.04	2.18	.06	2.30	.08
人員死亡	0.44	.02	7.64	.25***	2.97	.12*
財產損失	0.21	.01	-1.53	-.06	-0.45	-.02
企業賠償	1.03	.05	-1.11	-.04	0.80	.04
社會救助	3.17	.20**	-0.74	-.04	-0.16	-.01
年份	-0.36	-.17*	-0.57	-.23**	-0.61	-.31***
F	3.56***	6.68***	6.13***			
Adjusted R square	.10		.19		.18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討論

本研究在話語機會結構理論框架上，提出新媒體事件的集體情緒記憶的塑造，受到傳媒報道、事件性質和事件結局的影響。研究發現，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次數與網民對事件的討論呈顯著正相關，驗證了媒體在網絡集體記憶書寫中的重要角色。此外，事件的性質也直接影響網絡討論的頻率。事故災難、食品藥品安全類事件被人們討論和提及的次數最多，顯示這兩類事件在網民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頻率最大。根據話語機會結構理論，事故災難和食品藥品安全事件所面臨的「話語機會」包括三類。首先，此類事件與網民生活息息相關，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如近年來頻繁曝光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由於事關公眾健康和生命安全，往往對公眾帶來直接的風險感知。第二，此類事件經常發生，受到媒體高度關注，因此討論符合社會潮流，近年來的天災人禍常常見諸媒體，媒體對事故災難的報道一方面客觀及時地傳播災難的現狀，另一方面會以災難現場瀰漫的悲情為主要情感導向，產生所謂的「悲情傳播」效果(陳翔，2008；侯琰慧，2011)。媒體反復播放災區或事故現場的慘烈場面，對經歷災難的幸存者和救援人員的採訪，都有可能製造密集的情緒壓力，使受眾(包括沒有經歷過災難的，或者經歷過類似災禍的人群)感受到強烈的悲傷情緒(陳翔，2008)。第三，事故災難和食品藥品安全類事件往往和企業的違規操作或地方政府的監管不力相關，一般不牽涉到政治敏感問題，因此網民的討論具有「政治安全性」。

值得注意的是，由結構性矛盾與制度不公導致的新媒體事件，包括權力腐敗、司法不公、言論自由等由於制度不公、結構化矛盾而引起的事件，以及拆遷、徵地等由於執法暴力而產生的事件，雖然遺留的負情緒顯著高於正情緒，但無論在討論的頻次方面，還是在焦慮、憤怒等細化的負情緒方面的得分，都要顯著低於事故災難和食品藥品安全類事件。儘管這類事件最能反映轉型期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這些矛盾常常是由於制度不合理、社會利益結構失衡、社會階層地位不公而產生或激發的，但它們在人們集體記憶中的討論頻率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多，它們所激發的負面情緒也不如事故災難、食品藥品安全事件那麼強烈。這一現象反映了網民的關注點和研究者的關注點存在較大差異，同時也反映了集體記憶書寫的「話語機會」對不同的個體或群體來說是不一樣的。網民更關心與他們的生活有關、或者離他們的生活比較近的事件，尤其是那些與生命安全有關的議題，而研究者則醉心於探討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事件。這一發現也呼應了Dong(2012)的研究結果：中國網民對經濟和生活標準類話題的興趣要遠遠超過政治話題。而那些直接遭受此類事件衝擊的人，常常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在媒介資源的獲取、互聯網技能的掌握方面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還存在很大缺陷，甚至還不是網絡集體記憶的書寫者。除此之外，體現結構性矛盾的事件由於牽涉到制度缺陷、官民矛盾等深層次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政治敏感性，對於普通網民來說，過多的討論可能會帶來政治風險。這再一次呼應了話語機會結構理論，當外部環境不利於某一話語的塑造和傳播時，此類話語會在話語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

情緒是記憶窄化的一種表現，人們對情緒的記憶強度往往會超過對細節的記憶強度，令人目不暇接的新媒體事件，經過時間的沖刷，在大量「旁觀者」的心目中，遺留的痕跡往往不是事件的細節，而是最核心的要素和與之相伴的情緒，這些核心要素極有可能與事件的性質與結局密切相關。我們發現，不同性質的事件在人們集體記憶中遺留的情緒是不一樣的。惡性違法 and 社會治安類的事件在集體記憶中帶來的焦慮和憤怒情緒最嚴重。焦慮作為一種心理現象，是指個體面對不確定的危險而又缺乏有效應對手段時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情感反應方式(田代信雄，2008：17)。焦慮反映了人們對外部情境的認知和解釋，可源於外部威脅、壓力，也可脫離外部情境而存在，由想像中的威脅、壓力而引發(梅，2010：91-95)。憤怒是當個體感知到自己受到有意的侮辱或者傷害時體到的一種情緒狀態(Harris, 1964)，隨著社會化的發展，憤怒也被認為是對那些侵犯或者違反社會準則等負面事件的情緒反應(Carver & Harmon-Jones, 2009)，當自己所關心的群體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時，個體也會因此感到憤怒(Ortony, Clore, & Collins, 1990)。人們在瞭解負面事件的前因後果，並知曉事件有明確的責任方，對情境具有較強控制感時，會產生憤怒情緒(Lerner & Keltner, 2001)。近十年來的很多惡性違法事件和最近幾年出現的暴力恐怖事件使網民對社會的穩定和人身安全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情緒，而犯罪手段的惡劣則激發了旁觀者的憤怒情緒。

事件的結局作為另一個核心要素，與情緒記憶的維度也密切相關。「社會救助」是本研究所關注的事件結局中帶有明顯「正能量」的，因此帶來社會救助的事件會在集體記憶裏留下明顯的正情緒。但是這類事件同時也遺留了明顯的負情緒，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救助對象的悲慘經歷同樣會給旁觀者帶來悲傷的情緒體驗。悲傷是一種典型的負面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情緒，可由分離、失落和喪失(loss)等外部事件而引發(蔣長好、趙俞，2006)。根據Levenson(2003)的核心情緒理論，喪失是引起悲傷的重要因素。喪失的對象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未能實現的抱負、一個對個體有價值的物體或者是抽象的理想和道德價值；喪失的主體可以是自己、他人或者團體。小說、戲劇、電影或者新聞當中的悲劇也能引發人們的悲傷體驗，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與社會救助、人員入獄等結局相關的新媒體事件會帶來悲傷情緒。

導致人員入獄或人員死亡的事件會明顯地引發集體記憶中的焦慮和憤怒情緒，因為這類結局常常伴隨著的是惡性違法事件。在事件的結局是官員下台的情況下，集體記憶中的憤怒得到明顯的緩解。官員落馬的事件往往和貪污腐敗(如「房叔」、「表叔」、監管缺失(如山西問題疫苗、青島輸油管道爆燃事件)、執法不公(如城管暴力執法、強制拆遷)有關，而且官員的下台也明確了事件的責任承擔者，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引發憤怒(Lerner & Keltner, 2001)和對整個幹部群體素質的焦慮。再加上地方政府和官員在民間的低信任度(張海東、畢婧芊、姚燁琳，2014)使得「仇官」情緒在社會蔓延，一旦出現官員或幹部失責的情況，網民對某個具體官員的憎惡常常會發展為對整個幹部群體的敵視(于建嶸，2008)。而官員的落馬體現了對失職、失責、腐敗、違法違紀官員的懲罰，因此能顯著緩解人們的憤怒和焦慮情緒。

迫使政府或相關部門改變一項決策甚至某個公共政策，是網絡事件最具有深遠意義的結局。縱觀十幾年的網絡事件，政策的改變並不是某個具體的事件促成的，一些沒有任何關聯的事件往往指向的是同一項制度缺陷或同一個決策問題，它們在不同的時間段引發了相似的討論，歷經數年之後終於促成了政策的改變。而反PX工廠、反垃圾焚燒等導致某項決策變化的事件則能形成連鎖反應，一個事件引發的決策改變常常會波及到其他事件，迫使政府部門採取類似的舉措。在本研究的事件數據庫中，引起決策/政策變化的事件大致牽涉到如下幾個議題：環保(如各地反對PX工廠、造紙廠等鄰避運動)、兒童安全(貴州畢節兒童悶死事件、甘肅校車事故、毒奶粉、幼兒園虐童、微博打拐)、言論和思想自由(任建宇案、強裝綠壩)、計劃生育、拆遷徵地、勞教(孫志剛案、任建宇案、唐慧案)。這類議題的導火索常常聚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集了尖銳的矛盾衝突，如鄰避運動和強制拆遷徵地往往和強烈的對抗情緒相連；兒童安全事故常常是可以避免但又未能避免的，令人痛心疾首；計劃生育政策、勞教政策長期以來引發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使得民怨集聚已久。憤怒情緒往往會帶來樂觀的風險估計，促使個體為改變現狀做出冒險選擇 (Lerner & Keltner, 2001)，因此，憤怒情緒，尤其是因某一群體或集體遭受的不公而產生的憤怒，常常被認為是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動員時重要的情緒力量 (Jasper, 1998; Leach, Iyer, & Pedersen, 2006)。決策 / 政策的改變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新媒體事件中公民參與和網絡輿論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即便在事情過去之後，網民的討論中依然流露出強烈的憤怒和悲傷情緒，這也應證了心理學研究中的發現：情緒並非一個會即刻消失的狀態，情緒記憶一旦產生，則會充盈在個體的生活裏，即便經歷很長的時間也難以磨滅，情緒越強烈，記憶越久遠 (Conway, 1995; Pillemer, 1984)。

結論

本研究將從集體記憶和情緒分析的角度研究了2002–2014年發生的重要的新媒體事件，重點關注這些事件在網民記憶中的情緒呈現。對於新媒體事件的研究而言，本文的理論意義體現在四個層面。首先，本研究以話語機會結構理論為基礎，構建了形塑網民集體情緒記憶的理論模型，既涵括媒介的作用，又從事件本身的微觀特質出發，分析事件性質和結局對網絡集體記憶的書寫帶來的話語機會，並發現這種話語機會因人而異。其次，本研究突破了對單個個案的聚焦，以「事件數據庫」的形態，分析類型事件的共同點和相互之間的聯繫。第三，本研究突破了已有的大量研究只關注事件過程，而忽視事件結果的局限，探討不同類別、不同結局的新媒體事件如何形塑網民的集體記憶。第四，本文將集體記憶理論與情緒理論相結合，從新媒體事件對網民產生的長期影響角度出發，探索各種類型事件如何在潛移默化中構建人們情緒的記憶，人們對新媒體事件的情緒記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認知心理狀態。本文在方法上結合了傳統的內容分析和較為前沿的大數據方法，運用數據挖掘手段獲取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網民對新媒體事件的話語數據，採用大數據文本分析方法對話語中的情緒進行提煉，有一定的創新性。

本研究的不足在於微博數據的缺陷。一方面，微博內容並不能代表所有網絡民意，無法替代論壇、博客等更為深度的討論和微信朋友圈這種更為私密的討論；另一方面，像所有的網絡平台一樣，微博內容存在著被過濾或者刪除的可能，雖然不被允許討論的事件或許根本不可能存留微博，但目前抓取到的微博也難以反映網絡管制機制的複雜性，從而也難以就微博存量的「話語機會結構」作鞭辟入裏的闡述。此外，人們對某一事件的情緒反應極有可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事態的發展而變化的，未來的研究可以對某一類事件進行長期追蹤，探究人們對事件的情緒記憶變化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揚·阿斯曼 (2012)。〈文化記憶〉，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余傳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Yang Asiman (2012). *Wenhua jiyi*, in Feng Yalin, Asitelite Aier (Eds.). *Wenhua jiyi lilun duben*, Yu Chuanling etc.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阿萊達·阿斯曼、揚·阿斯曼 (2012)。〈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余傳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Alaida Asiman, Yang Asiman (2012). *Zuori chongxian—meijie yu shehui jiyi*, in Feng Yalin, Asitelite Aier (Ed.). *Wenhua jiyi lilun duben*, Yu Chuanling etc.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陳韜文、李立峯 (2010)。〈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第 103 期，頁 215–259。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10). *Xianggang buneng wangji liusi zhimi: chuanmei, shehui zuzhi, minzu guojia he jiti jiyi*. *Xinwenxue yanjiu*, 103, 215–259.
- 陳翔 (2008)。〈悲情傳播中的媒體倫理危機——以「5·12」汶川地震報道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 4 期，頁 31–37。
- Chen Xiang (2008). *Beiqing chuanbo zhong de meiti lunli weiwei—yi “5·12” wenchuan dizhen baodao weil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31–3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2000)。《媒介事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Dannier Daiyang, Yilaixiu Kaci (2000). *Meijie shijian*. Beijing: Beijing guangbo xueyuan chubanshe.

黃金蘭、林以正、謝亦泰等(2012)。〈中文版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詞典之建立〉。《中華心理學刊》，第54卷第2期，頁185-201。

Huang Jinlan, Lin Yizheng, Xie Yitai (2012). Zhongwenban yuwen tansuo yu zici jisuan cidian zhi jianli. *Zhonghua xinli xuekan*, 54(2), 185-201.

侯琰慧(2011)。〈媒介悲情傳播中的趨利避害問題〉。《新聞愛好者》(下半月)，第10期，頁47-48。

Hou Yanhui (2011). Meijie beiqing chuanbozhong de quli bihai wenti. *Xinwen aihaozhe (xia banyue)*, 10, 47-48.

胡百精(2014)。〈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第3期，頁98-106。

Hu Baijing (2014). Hulianwang yu jiti jiyi goujian. *Zhongguo gaoxiao shehui kexue*, 3, 98-106.

蔣長好、趙侖(2006)。〈悲傷及其應對的研究進展〉。《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08-114。

Jiang Changhao, Zhao Lun (2006). Beishang jiqi yingdui de yanjiu jinzhan. *Shoud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 108-114.

李良榮、鄭雯、張盛(2013)。〈網絡群體性事件爆發機理：「傳播屬性」與「事件屬性」雙重建模研究——基於195個案例的定性比較分析(QCA)〉。《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2期，頁25-34。

Li Liangrong, Zheng Wen, Zhang Sheng (2013). Wangluo quntixing shijian baofa jili: "Chuanbo shuxing" yu "shijian shuxing" shuangchong jianmo yanjiu — jiyu 195ge anli de dingxing bijiao fenxi (QCA).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2, 25-34.

李紅濤、黃順銘(2014)。〈「恥化」敘事與文化創傷的建構：《人民日報》南京大屠殺紀念文章(1949-2012)的內容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37-54。

Li Hongtao, Huang Shunming (2014). "Chihua" xushi yu wenhua chuangshang de jiangou: Renmin ribao Nanjing datusha jinian wenzhang (1949-2012) de neirong fenx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37-54.

劉怡、謝耘耕(2014)。〈網絡反腐輿情事件的形成與演變機制研究——基於2011-2013年重大公共網絡反腐輿情事件的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4期，頁69-74。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 Liu Yi, Xie Gengyun (2014). Wangluo fanfu yuqing shijian de xingcheng yu yanbian jizhi yanjiu — jiyu 2011–2013nian zhongda gonggong wangluo fanfu yuqing shijian de yanjiu.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4, 69–74.
- 劉于思 (2013)。〈數字化集體記憶的聯結轉向：維基百科中當代中國歷史事件的再現結構〉。
- Liu Yusi (2013). Shuzihua jiti jiyi de lianjie zhuanxiang: Weiji baike zhong dangdai zhongguo lishi shijian de zaixian jiegou.
-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02)。《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Molisi Habuwahe (2002). *Lun jiti jiyi*.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羅洛·梅 (2010)。《焦慮的意義》。朱侃如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Luoluo Mei (2010). *Jiaolv de yiyi*. Zhu Kanru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錢力成、張翹翹 (2015)。〈社會記憶研究：西方脈絡、中國圖景與方法實踐〉。《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215–237。
- Qian Licheng, Zhang Hexuan (2015). Shehui jiyi yanjiu: Xifang mailuo, zhongguo tujing yu fangfa shijian. *Shehuixue yanjiu*, 6, 215–237.
- 卜玉梅、周志家 (2015)。〈西方「話語機會結構」理論述評〉。《社會學評論》，第3卷第6期，頁74–83。
- Bu Yumei, Zhou Zhijia (2015). Xifang “huayu jihui jiegou” lilun shuping. *Shehuixue pinglun*, 3(6), 74–83.
- 田代信雄 (2008)。《焦慮與心理衝突》。路英智譯。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 Tiandai Xinxiong (2008). *Jiaolv yu xinli chongtu*. Lu Yingzhi (Trans.). Beijing: Renmin weisheng chubanshe.
- 于建嶸 (2008)。〈中國的社會洩憤事件與管治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1期，頁4–9。
- Yu Jianrong (2008). Zhongguo de shehui xiefen shijian yu guanzhi kunjing. *Dangdai shijie yu shehui zhuyi*, 1, 4–9.
- 周海燕 (2013)。《記憶的政治》。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 Zhou Haiyan (2013). *Jiyi de zhengzhi*. Beijing: Zhongguo fazhan chubanshe.
- 周海燕 (2014)。〈媒介與集體記憶研究：檢討與反思〉。《新聞與傳播研究》，第9期，頁39–50。
- Zhou Haiyan (2014). Meijie yu jiti jiyi yanjiu: Jiantao yu fans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9, 39–50.
- 周葆華、陳振華 (2013)。〈「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憶——以上海市大學生群體為例的經驗研究〉。《新聞界》，第14期，頁55–6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Zhou Baohua, Chen Zhenhua (2013). “Xinmeiti shijian” de jiti yiji—yi shanghai shi daxuesheng qunti weili de jingyan yanjiu. *Xinwenjie*, 14, 55–61.
- 張信勇 (2015)。〈LIWC：一種基於語詞計量的文本分析工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4期，頁101–104。
- Zhang Xinyong (2015). LIWC: Yizhong jiyu yuci jiliang de wenben fenxi gongju.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ke ban)*, 4, 101–104.
- 張海東、畢婧芊、姚燁琳 (2014)。〈2013年中國六城市社會質量的調查報告〉。李培林、陳光金、張冀(主編)，《社會藍皮書：201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頁130–15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ang Haidong, Bi Jingqian, Yao Yelin (2014). 2013nian zhongguo liuchengshi shehui zhiliang de diaocha baogao. In Li Peilin, Chen Guangjin, Zhang Ji (Eds.), *Shehui lanpishu: 2014nian zhongguo shehui xingshi fenxi yu yuce*, 130–151.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鍾瑛、余秀才 (2010)。〈1998–2009重大網絡輿論事件及其傳播特徵探析〉。《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頁45–52。
- Zhong Ying, Yu Xiucan (2010). 1998–2009 zhongda wangluo yulun shijian jiqi chuanbo tezheng tanx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45–52.
- 鍾智錦、曾繁旭 (2014)。〈十年來網絡事件的趨勢研究：誘因，表現與結局〉。《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頁53–65。
- Zhong Zhijin, Zeng Fanxu (2014). Shinianlai wangluo shijian de qushi yanjiu: Youyin, biaoqian yu jiej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53–65.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lexander, K. W., Quas, J. A., Goodman, G. S., Ghetti, S., Edelstein, R. S., Redlich, A. D., & Jones, D. P. (2005). Traumatic impact predicts long-term memory for documented child sexual abus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1), 33–34.
- Assmann, J., & Czaplicka, J.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25–133.
- Carver, C. S., & Harmon-Jones, E. (2009). Anger is an approach-related affect: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2), 183.
- Chmiel, A., Sienkiewicz, J., Thelwall, M., Paltoglou, G., Buckley, K., Kappas, A., & Holyst, J. A. (2011). Collective emotions onlin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mmunity life. *PloS One*, 6(7), e22207.
- Compton, R. J. (2003). The interface between emotion and attention: 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 2(2), 115–129.
- Conway, M. A. (1995). *Flash bulb memories*. Hillsdale, NJ: Erlbaum.

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 (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

- Dong, F. (2012). Controll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The real story. *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8(4), 403–425.
- Ferree, M. M., Gamson, W. A., Gerhards, J., & Rucht, D. (2002).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kenauer, C., Luminet, O., Gisle, L., El-Ahmadi, A., Van Der Linden, M., & Philippot, P. (1998). Flashbulb memori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ir formation: Toward an emotional-integrative model. *Memory & Cognition*, 26(3), 516–531.
- Harris, W. S., Gwynne, P., Warren, J., Weissler, A. M., & Schoenfe. C. D. (1964). Circulatory and humoral responses to fear and anger. *Journal of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 64(5), 867.
- Jasper, J. M. (1998).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13(3), 397–424.
- Kansteiner, W. (2002).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2), 179–197.
- Klaic, D. (2011).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communist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Heritage, Memory and Identity*, 4, 177.
- Koopmans, R., & Statham, P. (1999). Ethnic and Civic Conceptions of Nationhood and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Germany and Italy. In M. G. Giugni, D. McAdam, & C. Tilly (Eds.),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pp. 225–252).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oopmans, R., & Olzak, S. (2004). Discursive Opportun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Right-Wing Violence in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1), 198–230.
- 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6). Anger and guilt about ingroup advantage explain the willingness for political 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9), 1232–1245.
- Lerner, J. S., & Keltner, D. (2001). Fear, anger, and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146.
- Levenson R. W. (2003). Autonomic specificity and emotion. In R. J. Davidson, K. R. Scherer, & H. Goldsmith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pp. 212–22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L. J., & Edelman, R. S. (2009). Emotion and memory narrowing: A review and goal-relevance approach. *Cognition and Emotion*, 23(5), 833–875.
- Levine, L. J., & Pizarro, D. A. (2004). Emotion and memory research: A grumpy overview. *Social Cognition*, 22(5), 530–554.
- Lyubomirsky, S., Caldwell, N. D., & Nolen-Hoeksema, S. (1998). Effects of ruminative and distracting responses to depressed mood on retrieval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1), 166.
- McGaugh, J. L. (2004). The amygdala modulates the consolidation of memories of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emotionally arousing experiences.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1–28.
- Öhman, A., Flykt, A., & Esteves, F. (2001). Emotion drives attention: detecting the snake in the gra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30(3), 466.
- Olick, J. K. (1999). 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17(3), 333–348.
- Ortony, A., Clore, G. L., & Collins, A. (1990).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pacharissi, Z. (2015).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nnebaker, J. W., Chung, C. K., Ireland, M., Gonzales, A., & Booth, R. J. (2007). Th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LIWC2007. Retrieved on November 11, 2015, from <http://www.liwc.net/LIWC2007LanguageManual.pdf>.
- Peterson, C., & Bell, M. (1996). Children's memory for traumatic injury. *Child Development*, 67(6), 3045–3070.
- Pillemer, D. B. (1984). Flashbulb memories of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President Reagan. *Cognition*, 16(1), 63–68.
- Rimé, B. (2007a).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1, 466–485.
- Rimé, B. (2007b).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as an interfac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roces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limat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3(2), 307–322.
- Rimé, B., Mesquita, B., Boca, S., & Philippot, P. (1991). Beyond the emotional event: Six studies on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5(5–6), 435–465.
- Sotgiu, I., & Galati, D. (2007). Long-term memory for traumatic events: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during the 2000 flood in Italy.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1(1), 91–108.
- Van Dijk J.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rtsch, J. V., & Billingsley, D. M. (2011). The role of narratives in Commemoration: remembering as mediated action.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Heritage, Memory and Identity*, 4, 4–25.
- Xiong, X., Zhou, G., Huang, Y., Chen, H., & Xu, K. (2013). Dynamic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emotions in social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Sina weibo.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 56(7), 1–18.

本文引用格式

鍾智錦、林淑金、劉學燕、楊雅琴 (2017)。〈集體記憶中的新媒體事件 (2002–2014)：情緒分析的視角〉。《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105–134。